



交公粮

□ 张友忠

记得我小时候,每年收完麦子,家家户户都在麦场里把麦子晒干,然后装好袋子,拉到乡粮所交公粮。

那时候,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可我还是缠着爸爸要跟他去交公粮。其实,我是想到那里吃棒冰或喝汽水,当时这算很奢侈的事了。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爸爸终于同意我跟着他去了。于是,我们把粮食一袋袋装到地排车上,由爸爸拉着,在车把的一边拴上一根绳子,我在前面使劲往前拽,也算出一份力。

我们还没到粮所,就远远看到交公粮的车子排了长长的队,每辆车上都装着满满的粮袋子,爸爸把车子停在队伍后面挨起号来。遇到熟人,爸爸便和他们打招呼,聊起今年的收成。

说实在的,当时我还小,根本不知道啥是“交公粮”,便趁这时间他们,一位叔叔说:“交公粮就是把咱们种的粮食交给国家。”我还是不明白:“咱们自己种的,为什么要交给国家?”那位叔叔笑了:“小家伙,你上几年级?”我说:“二年级。”他说:“小朋友,老师应该教给你们了,咱们国家有农民在种地,有工人

在生产,有科学家在搞研究,有解放军在保卫国家,现在国家把地分给我们农民种,咱们丰收了,不能忘了还有工人、科学家、解放军,他们吃饱了才能给我们造锄头、拖拉机,造铅笔,才能保护咱们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欺负。等你当了科学家,也得吃咱们种的粮食啊。”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,但知道我最崇拜的解放军叔叔吃了咱们交的公粮更有劲打坏蛋后,心里很是自豪,拉起车子更带劲了。

车队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挪,几个小时过去了,临近中午,我们才进到粮所院子里。粮所里一棵树都没有,路两边墙上还残留着白底红字的标语,房檐下站着满头大汗等着交公粮的人,他们不停地用手里的草帽扇着风。

粮所的工作人员坐在磅秤旁的一把木椅子上,一边叨着“大前门”香烟,一边拨拉着算盘,椅子边立着一把特大的油布太阳伞。来交公粮的人一般都要拍拍他们的马屁,因为他说好就好,他说不好就让你拉回去晒个两三天再来,那可就麻烦了。

终于挨到我们的号了,爸爸来不及擦汗,先给工作人员递了根烟,那工作人员一边打着哈哈,一边顺手接过香

烟,放在磅秤上的账本边,那里已经放了不少香烟了。

这时,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像锥子又像刀的铁家伙——一头是尖的,中间带一道凹槽,只见他把尖头往粮袋里猛地一扎,再用力拔出来,凹槽里就带出了一小把麦粒。工作人员熟练地把麦粒倒进手里,拿几颗塞到嘴里,咯吱咯吱地咬一咬。那时,我其实并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,也不关心这些,只有爸爸认真地看着,因为他不希望被退回去。

“好了。过磅吧,要快点。”工作人员一边把咬过的麦粒朝磅秤边的地下吐出去,一边朝爸爸说着。

爸爸松了口气,急忙把车子拉到磅上。

工作人员拨着磅秤问:“哪个村的?叫啥名?”

爸爸一一回答着。

工作人员说:“这几天太忙了,扛袋子的人手不够,你自己扛。”

爸爸点了点头,便用左手抓住粮袋口,然后转过身子,用肩膀抵住袋子,用右手扼住袋子的底角,一使劲便扛在了肩膀上,然后一袋袋地往粮仓里扛,粮仓的入口在两头,要上五六米高的台

阶,搬上去后,打开袋口往下倒,完了把袋子收好,从上面飞快地小跑下来,顺手把袋子扔给我,让我整理好放到地排车的一边,他再把另一袋搬上去,几趟下来,衣服已是没有一丁点干地方了。

工作人员开好收据,爸爸仔细收好,拉起车子便向粮所外面走。我跟在爸爸后面,脑子里还在惦记着买吃的。这时爸爸回过头说:“饿了吧?给你买点吃的。”我咽了口唾沫:“饿倒不饿,就是有点渴。”

其实我知道,家里钱紧,爸爸不舍得在外面买饭。只要有一根棒冰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出了粮所大门,爸爸在门口摊上给我买了一根绿豆棒冰,五分钱;他自己花二分钱,跟摊主要了小半碗汽水,一口一口慢慢抿。

那个晌午,太阳毒辣辣的,我坐在空车上,爸爸在前头拉车,草帽一颠一颠地,汗珠子顺着后脖颈往下淌。我手里那根棒冰的凉气,一直甜到了心里。那种感觉,这辈子都忘不掉。

如今,再也不用交公粮了,农民种麦子还有补贴,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想起我小时候交公粮的事。

抓毒土

□ 任洪军

每年六七月份,地里的玉米和高粱,经过雨露的滋润,撒着欢儿生长。望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,我又想起20世纪70年代,为防治玉米和高粱的钻心虫,乡亲们拿着盆子或柳条筛子,头顶烈日在田间抓毒土的往事。

40多年前,在我们茌平博平镇(那时叫博平人民公社),许多村为防治玉米和高粱的钻心虫,每年7月在玉米长到五六十分高时,乡亲们用一种可湿性六六六粉,掺上晒干的细沙土,拌成毒土,溜进玉米苗和高粱苗的喇叭口内,来保障玉米、高粱的增产增收。

当时,用在农业生产上的六六六粉有两种,一种是粉剂,人们用手摇喷粉机防治谷子的钻心虫;一种是可湿性六六六粉,它是一种有机氯杀虫剂,属于高残留、高毒性农药,学名“六氯环己烷”,兼有胃毒、触杀和熏蒸三种作用,效果强而持久,能有效防治庄稼的蚜虫和钻心虫,还可以防治跳蚤和虱子。乡亲们便想出一个办法——用可湿性六六六粉拌上细沙土,溜进玉米苗和高粱苗的喇叭口,简单管用。

我们村地势低洼,生产队每年都要

种几十亩春玉米、春高粱和春谷子,这些春庄稼成熟得早,能赶在雨季前收完,避开渍涝,保住了收成,社员们的口粮也就有了着落。

1970年7月的一天,队长派我和一名女社员去找干沙土。吩咐我们当天拌好毒土,第二天全体劳力下地,给玉米抓毒土。

治虫刻不容缓,我们二人拉着地排车来到徒骇河东坝堤上,找到一处土质好的干沙土。把沙土运到生产队的场院里,铺上一块黄色的油布,把沙土薄薄地摊晒在油布上。那天天气酷似蒸笼,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,烤得人汗流浹背。为了把沙土晒干,我们在中午前后把沙土翻了四五遍。沙土在烈日的暴晒下,几乎不含一丝水分,捧在手上像水一样流淌,散发着独特的气息。

下午两点多钟,我们二人用地排车拉着两个筐箩和一张筛到场院里去筛沙土,拌毒土要求沙土又干又细,不能有半点杂质。我们仔细地把沙土筛好后,又用秤称好倒进筐箩里,然后拉到生产队的仓库里,在保管员的指导下,每个筐箩里掺上比例正好的可湿性六六六粉,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搅拌。六六六粉有一股刺鼻的味道,当时又没有防

毒面具,我们二人就在脸上围上一块湿毛巾,刺鼻的气味还是穿过毛巾钻进我们的口腔里,噎得人上不来气。为了把毒土拌均匀,我们闭上嘴巴、咬紧牙关坚持着,实在撑不住了,就跑到外边透透风,休息一会儿再接着拌。

第二天下午上工的铃声一响,社员们各自拿着盆子和柳条筛子来到玉米地里。队长首先给大家讲解抓毒土的方法和要求,并给大家做示范。社员们端着毒土,脸上布满了晶莹的汗珠,每人顺着齐腰高的玉米,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劳动。因为上午玉米和高粱的叶子上有露水,如果毒土不慎落到叶子上就会产生药害,危害庄稼生长,所以抓毒土都在下午进行。开始抓毒土时,我非常担心毒土抓多了或抓少了,抓少了消灭不了害虫,抓多了会造成减产或绝产。于是,我一边干,一边虚心向别人请教,直到完全掌握要领。

太阳火辣辣地烤着。我的上衣早已湿透,脸上的汗直往下淌,因手上有毒土也不敢擦。玉米叶像锯齿似的,不时在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红痕,汗水一浸,刺痒难忍。我一时忘了毒土的触杀性,伸手去挠,顿时像被火烧了一样。我急忙跑到地头,舀水把手和腿连洗了

两遍,可那药劲儿像针尖一样,已经扎进皮肉里了。低头一看,腿上红了一大片。队长笑着喊了一句:“毒土可不是雪花膏,别往腿上抹啊!”地里响起一阵笑声。

社员们有的戴着口罩,有的脸上捂着湿毛巾——可毒土那股呛味,在闷热的玉米地里还是挡不住。大家不吭声,只一味弯着腰,一行一行往前挪,毒土顺着指尖溜进喇叭口。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,可没人停下。那时候庄稼人的念想简单:手上有活,秋后就有粮。

当夕阳染红天际,乡亲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玉米地,洗去毒土的药渍,拧干衣服上的汗水,踏上回家的路。虽然劳累了一天,大家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

随着时代发展,我国对高残留、高毒性的六六六农药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,它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,电动喷雾器、无人机飞防早已取代了手抓毒土的土法子,高效又安全。

可每当我站在地头,望着绿油油的庄稼,还是会想起那些烈日下弯腰劳作的乡亲们。那些艰苦的日子,磨出了庄稼人结实的筋骨,也磨出了一辈人认准一个理儿就不回头的韧劲。

交公粮的车队、抓毒土的六六六粉早已不见了踪影。麦收后拉着地排车交公粮,伏天里拌毒土灭钻心虫,勾起的都是鲁西平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事记忆。

父亲拉着地排车,我在前面拽绳子,一根绿豆棒冰就是跟着去交公粮的全部念想;社员们顶着毒日头,把可湿性六六六粉拌上细沙土,溜进玉米苗和高粱苗的喇叭口,队长一句“毒土可不是雪花膏”惹得满地里笑声。前者以孩童视角串起叙事,质朴中透着温情;后者重在场面的还原与细节的刻画,把“土法上马”的艰辛写得扎实可感。

如今再读这些文字,让人动容的,不只是那段岁月的艰苦,更是庄稼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——拉着车子往前挪,弯着腰一行一行地干,手中有活,心里就有底。交公粮、抓毒土,这些农事如今都已远去,但那种认准一个理儿就不回头的精气神,什么时候都不过时。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,有些东西,值得被记下来、传下去。